

第八期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总主编 乐黛云 杨慧林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World Literatur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八期

主编 陈跃红 张 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8期/陈跃红,张辉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301-26407-2

I . ①比… II . ①陈… ②张… III . ①比较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世界文学—文学研究
IV . ① I206 ②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7287 号

书 名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第八期) Bijiao Wenxue yu Shijie Wenxue (Di-ba Qi)
著作责任者	陈跃红 张 辉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冰 朱房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0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 pup. 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hufangxu@ yeah. net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99 千字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 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主 办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承 办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

合 办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总 主 编 乐黛云 杨慧林

学术委员会

乐黛云 杨慧林 饶芃子 严绍璁 曹顺庆 谢天振 钱林森
王 宁 叶舒宪 陈跃红 高旭东 张文定 刘小枫

主 编 陈跃红 张 辉
副 主 编 张 冰 张 华

编辑委员会

陈跃红 程爱民 耿幼壮 胡继华 刘耘华 秦立彦 宋炳辉
魏崇新 王柯平 王宇根 徐新建 张 冰 张 华 张 辉
张 沛 张旭春

海外编委

Rodulf G. Wagner(海德堡大学) Haun Saussy(芝加哥大学)
David Jasper(格拉斯哥大学) Federico Masini(罗马智慧大学)
Galina Tihanov(伦敦大学)

编辑部主任 张 冰

编 辑 黄瑞明 朱房煦 雷 鸣 卢意芸

英文编辑 Peter O'Connor(泉涟漪)

编者的话

陈跃红 张 辉

本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庆祝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建所 30 年周年特刊。

“北大比较所”——大家习惯于使用这个亲切的简称,其前身是成立于 1981 年 1 月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1985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时代的机遇与北京大学独特而深广的人文底蕴,孕育了这所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机构。与这个机构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些熟悉而闪光的名字——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乐黛云……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胸怀世界的大气象,成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和领路人。

而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就在同一年(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也在北大和全国数十所大学的齐心努力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成立。这应该不是偶然或巧合。“北大比较所”30 年来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所在地,起到了联系国内外比较文学学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比较所的创立与发展,离不开以乐黛云、严绍璿、孟华等杰出学人为代表的几代比较所人的踏实努力,也离不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体成员和海内外同仁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可以说,“北大比较所”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同期成立,既开辟了中国人文学术的新天地,也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共同体乃至精神共同体的初步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和展望“北大比较所”的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她是中国比较文学 30 年历史充满活力的见证;她也是我们展望未来和确定前进方向的一个公共“瞭望台”。纪念“北大比较所”30 周年,并通过这个个案以一斑窥全豹,正是我们编辑这期特刊的宗旨和目的。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迄今已编辑八期,历时四年。令人高兴的是,以这个刊物为“龙头”,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秘书处为依托,“北大比较所”还与海内外同仁一道,设计和合作了一系列与之相互呼应、相互配套的“姊妹项目”。这再一次展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人团结合作、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下面几个项目: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讲座系列”。自 2012 年以来,这一讲座系列由“北大比较所”、本刊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导,已举行近 30 场,成为国际国内人文学人特别是比较文学学人交流沟通的最重要讲坛之一;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这套文库也从 2012 年开始运作,目前有 24 位学者加盟,已先期出版 60 后、70 后学人代表性作品 16 本,该项目还得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市文化出版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高级研修班”。这一项目,拟每两年举行一次,重点是为全国比较文学青年同行提供一个提升学术、交流信息

的机会,已与四川外国语大学合作举办第一届,第二届正在筹备之中;四、“中国比较文学网”。日前,这个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网上家园已基本完成申请域名(ccla.top)、设计网页等前期工作,该网站可望于近日开通。

另据悉,“北大比较所”30年所庆仪式与“比较文学的人文学品质:学科间的交汇与融通”学术研讨会即将于2015年11月21日在燕园隆重举行,本刊下期将专门报道这次活动,并介绍会上同行们的最新创获与精彩观点,敬请关注。

三十年历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国比较文学学人,秉承优良的传统,正以对人文研究的热诚与坚守,以对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深切关注与思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目 录

编者的话	陈跃红 张 辉(1)
------------	--------------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30 周年特辑

我的比较文学之路

——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发展 30 周年而作	乐黛云(1)
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 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严绍璎(21)
众说纷纭德理文	孟 华(40)
向近代早期的英语读者介绍中国:17 世纪卫匡国《鞑靼战纪》的英译研究	康士林(52)
同与异	
——读谢阁兰的《庸匠》一诗	车槿山(66)
阐释的僭政与意义的流亡:伽达默尔 vs. 德里达	张 沛(70)
埋葬权与战争法序言	
——格劳秀斯《论战争法权与和平法权》第 2 卷第 19 章讲疏	林国华(76)
多重矛盾构筑的“家园”	
——华兹华斯的长诗《在格拉斯米尔谷地卜居》	秦立彦(88)
连续与断裂: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怎样的革命?	
——从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说起	张 源(99)
享保大象的神灵化:神兽大象与预知未来、吉瑞之兆	张哲俊(116)
“棉被”下的自我	周 阅(129)
《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跋文读释	钱婉约(134)
《诗经》英译赏析四题	顾 钧(147)

海外专递

Re-imagining the Pastoral: Anonymity and the Late-Sixteenth-Century Reader in Fray Luis de León's First Ode	Anthony John Lappin (156)
--	---------------------------

学术焦点

- Introduction to Essays on Translating Emily Dickinson
..... Martha Nell Smith & Wang Baihua (182)
- Discussing Emily Dickinson into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Project Laura Lauth with Dali Tan (184)
- 狄金森在中国的经典化建构
——以汉译诗作进入中小学课本为中心 王柏华 赖丹婷(199)
- Manuscripts, Print, Digital:
Reading Emily Dickinson in Translation Martha Nell Smith (214)

青年园地

- 早期佛教译经与经典的书面化确立 范晶晶(226)
- 《代表人物》的生成与意义 余静远(237)

学术动态

- 2015 年里斯本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会报告 周小仪(246)/“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讲座”综合报道 雷鸣(247)/“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丛书”第三次编纂讨论会综述 王洛岚(248)/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全国学术研讨会举行 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250)

新书快递

-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的前世今生 陈戎女(253)
- 在荒寂的世界里寻求诗意
——写在《自学成才的人们》中译本出版之际 刘洪波(255)
- 构建中国叙事学大厦的先行者
——读傅修延《中国叙事学》 周兴泰(258)

稿约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集刊)》稿件体例 (260)

Contents

Preface Chen Yuehong & Zhang Hui (1)

ICLCC 30th Anniversary Special Issue

M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ilgrimage—Commemo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Yue Daiyun (1)

My 50-Year Homework Assignment: Melding Comprehensive Mastery with
Reason and Rhetoric Yan Shaodang (21)

Disparate Ideas on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Meng Hua (40)

Introducing China to Contemporary English Readers: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artino Martini's

17th Century *De Bello Tartarico* Nicholas Koss (52)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Reading Victor Segalen's *Les Mauvais Artisans* Che Jinshan (66)

Hermeneutic Despotism and Exile of *Logos*: Gadamer vs. Derrida Zhang Pei (70)

Foreword on Burial Rights and Law of War

——Hugo Grotius's *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

Annotations of Volume 1 Chapter 19 Lin Guohua (76)

Home Constructed on Multiple Layers of Contradictions

——William Wordsworth's Poem *Home at Grasmere* Qin Liyan (88)

Continuity or Rupture; Rethink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om Francois Furet to Tocqueville and Émile Durkheim ... Zhang Yuan (99)

Spiritualization of Kyōhō Elephants: Spiritual Elephants, Future Anticipation and

Propitious Omens Zhang Zhejun (116)

The Self Underneath the "Sheets" Zhou Yue (129)

Understanding *The Incomplete Hand-Written Copy of Shuowen on the Chinese Mu* (木)

Radical in the Tang Dynasty Through Reading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ostscript Qian Wanyue (134)

Four Topics on Appreciat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Gu Jun (147)

Re-imagining the Pastoral: Anonymity and the Late-Sixteenth-Century Reader

in Fray Luis de León's First Ode Anthony John Lappin (156)

Introduction to Essays on Translating Emily Dickinson	
..... Martha Nell Smith & Wang Baihua	(182)
Discussing Emily Dickinson into Chinese: Lessons from	
the Cooperative Translation Project	 Laura Lauth with Dali Tan (184)
On Canonization of Emily Dickinson in China:	
A Study of Dickinson's Poe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Chinese Textbooks	 Wang Baihua & Lai Danting (199)
Manuscripts, Print, Digital:	
Reading Emily Dickinson in Translation	 Martha Nell Smith (214)
 Buddhist Translations from the 3 rd Century BC to the 5 th Century AD	
and the Documentation of Buddhist Canons	 Fan Jingjing (226)
The Genesis and Meaning of <i>Representative Men</i>	 Yu Jingyuan (237)
 Information	 (246)
 Book Reviews	
 The Reincarnation of <i>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i>	 Chen Rongnü (253)
Seeking Poetic Thought in a Deserted World	
——For the Coming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Самоучки</i>	 Liu Hongbo (255)
The Forerunn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rratology Edifice	
——Reading Fu Xiuyan's <i>Chinese Narratology</i>	 Zhou Xingtai (258)
 Call for Papers	 Editorial Board (260)

我的比较文学之路

——为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发展 30 周年而作

乐黛云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端

中国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1987年6月我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周翰先生在日本京都日本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作了一次题为《中国比较文学的今昔》的精彩讲演,可以说这是新兴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国际间的一次重要亮相。他强调了中国比较文学开端的两个特点,他说:“我分析了中西比较文学起源之不同。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①中国比较文学的另一个源头则“是用从西洋输入的理论来阐发中国文化和文学”^②。他认为,中国比较文学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西文化相触和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与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是分不开的。它始于推介外国文学,并力求在外国文学的语境下重新认识自己,以寻求发展新路,但它的根基始终是中国社会和悠久的中国文学传统。

如梁启超所说,小说是改革社会的利器,应担当起塑造新人格、新人心、新风俗、新学艺,乃至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的重任。他还指出要完成这一重任,决非旧小说所能担当,必须引进西方的新小说。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自戊戌政变(1898)至辛亥革命(1911)十三年间,中国出现的翻译小说已达六百余种。可见翻译小说的兴起是与振兴民族、开发民智、提高国民人文素质的历史要求紧密相连的。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国维首次指出 20 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无不借助于中西思想的“相化”和“深通”。他特别强调参照西方理论来综合探讨中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一些问题,他对中国哲学和文学的贡献无一不是在汇通中西古今的基础上取得的。他明确肯定了哲学和美术的独立价值,提出在言志、载道之外,以满足“纯粹之知识和微妙之感情”和以“解除人生之怀疑与痛苦”为旨归的哲学与美术才是最尊贵、最神圣的。这显然是汇通中西、另创新意的结果。

早在 1917 年,当时在哈佛就读的梅光迪和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胡适还进行过一番辩论。胡适从进化论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弃旧图新的历史;梅光迪却认为历史应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纪录:“我们必须理解,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③吴宓当时也强调“只有

① 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梅光迪:《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中国学生》月刊,第12卷,第3期。

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①。这就是他们后来提出“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前因。

这些都是中国比较文学产生的前奏,可见中国比较文学既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中国新文学正是在古今中外多元文学的交响中产生的。在这样的形势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清华大学外文系率先开设了一些与比较文学相关的课程,如吴宓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R. Winter)开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1929年至1931年,清华大学特聘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学者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两门课程。他的讲稿被写成《比较文学》一书,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②清华大学培养了第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季羨林、钱锺书、李健吾、杨业治等。不久,傅东华和戴望舒又相继翻译了罗力耶(Frederic Loliee)的《比较文学史》(1931)和保罗·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论》(1934),第一次在中国系统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1934年出版了梁宗岱的《诗与真》,作者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对西方文学进行了比较文学方法的探讨。1936年又出版了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全面评述了中国小说、诗歌、戏剧在德国的传播。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进一步论证了以中国的《周颂》《大雅》、印度的《梨俱吠陀》、《旧约》里最早的诗篇、希腊的《伊利亚德》《奥德赛》为代表的四种约略同时产生的文化如何各自发展,渐渐相互交流、变化、融合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至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③。另外,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和钱锺书的《谈艺录》也都在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79年,出版了钱锺书的《管锥篇》,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栗栗”之间突显出互为参照的重要文学现象。继《管锥篇》之后,北京大学四位教授相继发表了四本比较文学论著: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在比较美学、诗、画、戏剧等交叉学科的比较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季羨林的《中印文化史论集》(1982)对中印文学关系进行了独到的深入讨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树立了榜样;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1984)着重研究了《梨俱吠陀》与《诗经》的比较,并论及“符号学”“诠释学”在中国的应用;杨周翰的《攻玉集》(1984)则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重新解释了莎士比亚、弥尔顿、艾略特等欧洲作家的作品。南京大学范存忠的《英国文学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也都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我如何走上比较文学之路

我追随前辈,走上比较文学之路,是偶然,也是必然。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欧美留学生,我被分配去教一个班的现代文学。我的这个班二十余人,主要是欧美学生,也有从澳大利亚和日本来的。为了给外国学生讲课,我不能不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成规。除鲁迅、《金光大道》之外,我开始讲一点徐志摩、艾青、李金发等“资产阶级”作家。为了让我的学生较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我不得不进一步去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多年在学术界未曾被研究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开始系统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是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的。从对早期鲁迅和早期茅盾的研究中,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不约而同都受了德国思想家尼采

① 吴宓:《中国的新与旧》,《中国学生》月刊,第16卷,第3期。

② 参阅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7页。

③ 闻一多:《神话与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01—206页。

很深的影响。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位三十年来被视为煽动战争、蔑视平民、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尼采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尼采学说正是作为一种“最新思潮”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注目。尼采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虚伪、罪恶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已经看到并力图避免这些弱点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正是极好的借鉴。他那否定一切旧价值标准、超越旧我、成为健康强壮的超人的理想,深深鼓舞着正渴望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的同感和共鸣。无论从鲁迅塑造的狂人所高喊的“从来如此——便对么?”的抗议,还是郭沫若许多以焚毁旧我、创造新我为主题的诗篇,都可以听到尼采声音的回响。但是尼采学说本身充满了复杂混乱的矛盾,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山峰和另一个山峰,通向山峰的路却没有。各种隐晦深奥的比喻和象征都可以被随心所欲地引证和曲解。因此,尼采的学说在不同时期也就被不同的人们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利用。

1981年,我根据上述理解,写了一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客观地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1986年,北京大学第一次学术评奖,还把这篇文章评为优秀论文。事隔五六年,还有人记起这篇文章,我很觉高兴。后来,它又被选进好几种论文集,并被译成英文,发表在澳大利亚的《东亚研究》上。

与研究尼采同时,我编译了一本《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30年的封闭和禁锢,我们几乎和国外学术界完全隔绝。我感到这些论文在某些方面颇具特色。例如谈到鲁迅的思想变化时,把他和一些表面看来似乎并无关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萨特等人进行了比较,指出共同点:他们都甘愿牺牲舒适的环境去换取不确定的未来;他们都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也不想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索取报偿;他们理性的抉择都曾被后来的批评家们误认为一时冲动或由于“绝望”,甚至是受了“现代符咒——革命”的“蛊惑”!这样的比较说明了鲁迅的道路并非孤立现象,而是20世纪前半叶某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这部《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包括美国、日本、苏联、加拿大、荷兰、捷克、澳大利亚七个国家的二十篇文章,并附有《近二十年国外鲁迅研究论著要目》(共270篇),对国内鲁迅研究起了一些开阔视野、促进发展的作用。对我自己来说,则是使我初步预见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作品进行“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我于1987年写成的一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写的。这篇文章1988年发表于《文艺报》,同年10月为《新华文摘》所转载。1988年国际比较文学第12届年会(慕尼黑),我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被选入了大会论文集。

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羨林、李赋宁、杨周翰、杨业治、金克木等教授都对比较文学表示了程度不同的兴趣,加上我和当时杨周翰先生的博士生张隆溪,还有张文定(北大出版社编辑)、温儒敏(中文系王瑶先生的研究生)等人,我们一起于1981年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学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羨林教授任会长,钱锺书先生任顾问;我则充当了马前卒,号称秘书长。学会生气勃勃,首先整理编撰了王国维以来有关比较文学的资料书目,同时策划编写《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

1981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得到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进修一年。我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向往已久,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办者之一白璧德教授(Irving Babbitt)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汇合曾经是这样一往情深,也不只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哈佛归来的“哈佛三杰”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所倡导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东西文化的汇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空间,还因为1981年正在担任哈佛东西比较文学系系主任的纪延教授(Claudio Guillen)多次提到:“我认为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他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吸引了我。遗憾的是在哈佛的一年,由于我的英语不够好,我始终未能和纪延教授深入讨论我想

和他讨论的问题,但我却大量阅读了比较文学的基础理论和有关资料,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1982年和1983年,我有幸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邀请为客座研究员,在那里,我结识了白之教授(Cyril Birch)和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James Liu)。白之教授对老舍和徐志摩的研究,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很喜欢参加白之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讨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学们各抒己见,谈谈各自对书中人物的看法。一位美国学生说,她最喜欢的是三仙姑,最恨的是那个村干部。这使我很吃惊,过去公认的看法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四十多岁、守寡多年,还要涂脂抹粉、招惹男人的坏女人;村干部主持正义,训斥了三仙姑。但这位美国同学也有她的道理:她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她也是人,而且热爱生活,她有权利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却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欺压;村干部多管闲事,连别人脸上的粉擦厚一点也要指责,正是中国传统的“父母官”模式。我深感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提供了理解和欣赏作品的多种角度,使作品的生命得以扩展和延续。这个讨论班给我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使我在后来的比较文学教学中论及接受美学的原理时有了丰富的内容。

在伯克利的两年里,我精读了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所写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以及他关于李商隐诗的一些相当精辟的论述,和他进行过多次讨论。他对中西诗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他的思考给了我多方面的启发。首先是他试图用西方当代的文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论,在这一过程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且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空间,但将很不相同、长期独立发展的中国文论强塞在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实用理论等框架中,总不能不让人感到削足适履,而且削去的正是中国最具特色、最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东西。其次,我感到他极力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论的语境中来进行考察,试图围绕某一问题来进行中西文论的对话,得出单从某方面研究难于得出的新的结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后来,这两方面正是我研究比较文学的两个重要路向。刘若愚教授是一个热忱、孤独而颇有魏晋风度的人,常邀请我从伯克利到斯坦福去讨论问题,他酒量很大,每至微醺,便嘲笑我研究中国诗而不懂得喝酒,贻笑大方!

1984年夏天回国,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地方性比较文学研究会,并在三年内,接连开了三次学术讨论会。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外国文学学会年会上,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讨论会。紧接着,第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983年8月),大会由钱锺书先生致开幕词,刘若愚、厄尔·迈纳、西里尔·白之和王佐良、杨周翰、许国璋、周珏良、杨宪益等世界比较文学著名教授和年轻一代的张隆溪、赵毅衡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主题是“抒情和叙述”。大会决定三年后第二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印第安那、洛杉矶三地召开,并决定出版《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看来,成立全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5年10月,由35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正式成立。参加单位各交200元会费作为会议经费。由于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学会,上级机构拒绝批准。费尽周折,才由季羡林先生通过胡乔木同志,经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特别讨论通融,才得批准。大会选举季羡林教授担任名誉会长,杨周翰教授担任会长。从此,中国比较文学走上了发展的坦途。

三、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实绩

有了全国性组织后,我深感最重要的下一步就是要拿出实绩。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是中国文化热勃然兴起的年代,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未来丛书》的出现、《文化:中国与世界》丛刊的发行共同掀起了中国的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我是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但中国文化书院其实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多元化的学术团体。以一代学术大师梁漱溟为主席、冯友兰为名誉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一开始

就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新文化”，要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我们举办的首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学员一万二千余人，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四十余名中老年导师多次分别到全国十多个中心城市进行面授，并与学生共同讨论。我曾于暑假参加过三次这样的面授，有些场面十分令人感动，使我至今难忘。每次参加面授的学员，大体都是两三百人，他们大多是中小学教师、中下层干部，特别是文化馆、宣传部的干部，也有真正的农民和复员军人；他们有的从很远的山区或边远小城徒步赶来，扛着一口袋干粮和装着纸笔和几本书的土布书包。他们不愿花钱租一个为他们安排好的学生宿舍床位，就露天铺张草席在房檐下或凉亭里睡觉。我常常和他们聊天到深夜，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我发现在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的心里，传统文化的根很深，这有好也有坏。例如他们大都认为“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是理所当然，否则就会“乱套”。我和他们讨论过多次，他们仍然认为我说的“男女共同主内，男女共同主外”根本不可行。记得那次在长沙岳麓山岳麓书院面授，我的讲题是“弗洛伊德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意义”。在朱老夫子的学术殿堂上讲弗洛伊德，心里觉得多少有些反讽意味。课后讨论，学员几乎都认为以“超我”的“道德原则”来压抑“自我”的“利害原则”和“本我”的“快乐原则”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就会你争我夺，天下大乱。我深有感触，真正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谈何容易！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一方面讲中国文化，一方面介绍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现状。研究班编写了《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日本文化概论》《比较方法论》《比较史学》《比较法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等十六种教材；除教材外，又编辑出版了导师面授的讲演稿四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由三联书店出版。我在各次演讲中影响较大的是“从文学的汇合看文化的汇合”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的未来”。

这段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有很深的影响。我当时认为在北京大学以至全国展开比较文学首先要作出实绩。所谓实绩一是学科建设，二是人才培养。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一套《比较文学丛书》，丛书分三集，每集四册，包括比较文学理论、国外中国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三个方面。后来又出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十余本，《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六本，《中外比较文化丛书》九本。我在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相继开设了“比较文学原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第一次开设，选课的学生很多，学生的欢迎促使我更好地准备，同时大量增进了我自己的系统知识的积累。

1987、1988年，连续出版了我的两部专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第一本书大致体现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谈我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认识；第二部分谈中外文学关系；第三部分是试图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启发下，重新解读中国文学，也就是所谓“阐发研究”。我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如果有所创新，那就是着重探讨了文艺思潮的跨文化影响。任何文艺思潮，如果真是具有普遍性，就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在那里被接受，并发生变形，得到发展。要对这一思潮全面了解，就不能不深入研究它在各地传播和发生影响的情形。例如浪漫主义，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种文艺思潮来看，它如何传入朝鲜、日本、中国和印度，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掺进了哪些新的内容，又如何为不同文化所接受，犹如地层中的岩系，不断向外伸展、成长、发育和变形。不了解这种过程也就不能认识文学思潮整体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的很多特征又都能在许多不同文化中发现其不同表现，如屈原和李白诗歌的某些因素。它们本身并不属于浪漫主义思潮，但它们必然影响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长期研究的很有趣味的课题。

我在20世纪80年代更为关注的是接受和影响的关系。我首先企图界定“影响”一词的内涵，把“影响”和模仿、同源、流行、借用等概念分别开来。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谓一个作家受到另一个外国作家的影响，首先是指一些外来的东西被证明曾在这位作家身上或他的作品中产生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在他自

己国家的文学传统里和他自己的个人发展中,过去是找不到的,也不大可能产生。其次,这是一个有生命的移植过程,通过本文化的过滤、变形而表现在作品之中。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大规模的文学影响,常发生在当一国的美学和文学形式陈旧不堪而急需一个新的崛起或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需要激烈地改变方向和更新的时候。“影响”需要一定的条件,影响的种子只有播在那片准备好的土壤上才会萌芽生根。它往往首先发端于一种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启发,某种外来的东西突然照亮了作者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给予一种解决的新的可能。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他喜欢美国作家爱伦·坡,就因为爱伦·坡的作品中,他自己头脑里一些模糊的、未成形的构思被完美地塑造出来。T. S. 艾略特认为他受到一些其他作家的影响,往往是因为这些作家能“逗引”起他内心想说的话。庞德所以认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就因为中国诗对他所痛感的“西方当代思想缺乏活力”“宗教力量日益衰退”等问题提供一种解决的新的可能;而中国诗歌的简洁、含蓄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繁言赘语、含混不清也是一种冲击,而给诗人以启发。如果说这种“启发”往往是不自觉的偶然相遇,那么影响的第二步——“促进”——就是有意识地寻求、理解和加强。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认同和消化变形的过程。文学影响最后还要通过文学表现出来。20 世纪 70 年代德国接受理论的兴起对上述传统影响研究进行了全面刷新。事实上,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播送者对接受者来说是“影响”,接受者对播送者来说,就是接受。过去的影响研究多研究播送者如何影响接受者,却很少研究播送者如何被接受。

如今这一单向过程改变为双向过程,就为这一领域开辟了许多新的层面。首先,由于“接受屏幕”的不同,一部作品在本国和在外国被接受的情况也显然各异。通过某种成分被拒绝或接受或改造的复杂过程,我们不仅可以更多面地发掘出作品的潜能,而且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文化体系的特点;其次,对外国作品的接受,往往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反射出接受者自己的不同个性。另外,通过关于接受的研究,还可以考察时代的变化。一部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常常因时代的不同而被强调不同的方面;再者,关于接受的“反射”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五四以来,借助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反观本国文化而有新的启悟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诗人郭沫若说他从小熟读《诗经》,但“丝毫也没感觉受着他的美感”,只是在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后,“才感受到了同样的清新,同样的美妙”。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它们都说明了“接受的反射现象”对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最后,接受理论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提供了编写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体例的新型文学史的可能。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兴起后,如果它是真有价值的,就会逐渐获得世界性,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无不如此。不同文化体系在接受这些思潮时,由于“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的不同,必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并在深入本体系文学时,完成新的变形。这种变形既包含着该文化系统原来的纵向发展,又包含着对他种文化传统横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的素质,文学本身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重写文学史,就要着重考察各种思潮、主题、文类、风格、取材以至修辞方式、诗歌、格律等文学的构成因素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继承、发展、相互影响和相互接受。新的文学史将由“创造”“传统继承”和“引进”三个部分组成,而对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予以关注。这种时刻,读者的文学观念往往可以穿越或排斥以往的界限,敏于接受外来影响,并改变自己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在接受理论的基础上还可以从读者角度出发,研究读者心态的历史。如果整理五四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外国作家被中国读者所选择和接受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被强调的不同方面,就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近百年中国社会心理的发展和变迁。总之,接受理论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潜在于作品的各种可能性,因而为偏于实证、路子越走越窄的传统影响研究带来了全面的活泼的生机。

《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部分是讨论阐发研究。所谓阐发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借助外国文学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文学。这曾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拿出实例,说明这种阐发确实对推动中国文学发展有益或有害。中国封闭了 30 年,这正是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十分迅速的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初,西方发展了数十年、经历过各种复杂阶段的文艺思潮同时涌入中国。历时性的发展变成了共时性

的并存。这本书的这一部分以小说研究的各种流派为纲,如传统小说分析(小说世界的外延研究)、新批评派(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结构主义(决定着表达方式的深层结构)、精神分析学(潜意识及其升华)、接受美学(作品的框架与意象挖掘)、叙述学(事序结构和叙事结构)、阐释学(“推末以至本”和“探本以穷末”)等,企图说明在这些思潮的启发下,已经开辟和可能开辟的新的学术空间。其实,大量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绝不是随意的、偶然的、与本土语境无关的;恰恰相反,任何一种理论的传入,都经过了中国社会实际与文化情景的筛选,并实际有益于中国文学的改进,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例如出于对数十年苏联文艺理论只强调社会环境和社会效用的逆反心理,新批评派的细读批评和结构主义叙述学就很容易被接受;有些西方新观念,中国文学传统中很少提及,如精神分析学和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由于其新鲜,也较容易引起大家注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西方文学理论正是由于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容易找到契合点而引起广泛兴趣,如阐释学就很容易与中国的“述而不作”“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等道理相通;接受美学与中国的“作者以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横看成岭侧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等说法也有类似之处。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也颇盛行,这是由于人们急于了解数十年来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进展。《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并不一定有什么新的发明,但在当时却是一本有用的书。正如我的老师季羨林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的:“这一部书很有用处,很有水平,而且很及时。杜甫的诗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很想把这一部书比做‘当春乃发生’的及时好雨。”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更是指出了我的这些最初的学术成果与我个人性格的关联,他说:“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乐黛云同志的治学道路显然有与她个人的知识面宽广和具有开拓精神等素质有关,但它却能给人以普遍性的启发,特别是在当前各种新学科、新方法纷至沓来的时候。”

我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首先从有实际联系的影响研究入手,这大概与我过去出身于研究现代文学史有关。但我越来越感到完全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也有非常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这些领域深深地吸引着我。我那本《比较文学原理》重点就在于主题学、文类学和跨学科研究的探讨。从内容方面来说,文学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困扰往往可以从全不相干的文学体系的作品中看到。例如自古以来,大量文学作品表现了爱情与政治、社会、道德观念的冲突;当然,由于不同时代、环境、文化、民族心态的不同,共同的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有着很不相同的表现,但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对纯真爱情的同情和对政治社会压迫的抗议——则是基本相同的。这种关于共同主题的研究曾被指责为缺乏实证的事实联系,或缺乏对“文学性”本身的分析。我认为作家对于主题的选择首先是一种美学决定。这种选择决定着结构的模式、题材的提炼和题材的表现。同一主题如何由于不同的艺术表现而形成不同的艺术创作,同一题材又如何由于作者思想的不同深度而提炼出感人程度不同的作品等等,如果不把“文学性”的分析仅仅局限为语言分析,那么,这种主题和题材及其艺术表现的分析显然也是一种“文学性”的分析。主题学还研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地区的人何以会提出同样的主题;同时也研究有关同一主题的艺术表现、创作心态、哲学思考、意象传统的不同,并对其继承和发展进行历史的纵向研究等等。会通中西文学,开展有关主题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

在文学形式方面,我对中西文体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文类学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大文化体系,大致都能找到从口头创作发展为诗歌、戏剧、小说三种类型的文体的迹象,而小说都是在诗歌、戏剧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如果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来做一些对比分析,可以看到中国长篇小说与西方长篇小说显然有不同的发展源流。西方小说从史诗发展为中古传奇(Romance)再发展为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则从大量叙事文体发展为稗史、民间演义,加上佛经故事和市井短篇小说,逐步演化为长篇小说。但是,中西小说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的发展过程。首先,中、西长篇小说的产生都是和都市文化、商业化、工业革命、印刷术发展和教育普及